杜重远是党的患难之交

沙海林

杜重远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结识了他的女儿杜毅和杜颖两位大姐，我们多次谈起过她们的父亲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过往，常常都会感动不已。

他不是共产党员，却自愿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在生死关头帮助了共产党；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这个“罪名”而惨遭谋害。邓颖超同志曾深情回忆说：“杜重远是党的患难之交”。

一

杜重远本是位精明的实业家，不到而立之年就在沈阳创办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机器制瓷工厂——肇新窑业公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击碎了他“实业救国”的梦想。杜重远被迫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实业，离别故土，流亡关内，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

他在北平参与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而后，走遍华北各地，大江南北，到处演讲募捐，宣传抗日。在上海结识了邹韬奋、夏衍、沈钧儒、胡愈之等革命知识分子，走近了共产党。

1931年11月底，杜重远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这次见面，是在中共领导人撤离上海的最后关头，是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周恩来给予了杜重远极大的信任——早在当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向忠发被抓，严重威胁党在上海全部领导机关的安全。当时，从苏联赶回上海的周恩来果断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恨之入骨，1931年9月“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

在这异常惊险的氛围中，杜重远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鼓励他说：“您所从事的宣传鼓动群众工作，正与我党的方针相符，所以咱们已经站在一条战线上了。”杜重远告诉周恩来，现在北平已经建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近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救济流亡到关内的难民，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周恩来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团结起来，为反对和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而斗争。”这次会面，杜重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那种谦虚而自信所折服，深感共产党才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二

杜重远的又一身份，是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的特约记者，他用手中的笔为共产党鼓与呼。

1932年2月，他采写了《向前干去》一文发表于《生活》周刊。文中用近三分之一的笔墨，描写了以江西井冈山为中心的共产党根据地的情形：“此间共党情形，亦与世间所传说者迥异。共党首领不居城镇，不住华屋，均伏处于山下，或地下，藉以防飞机炸弹之袭击。共军惯于登山，习于跑路，无事时常以此二者相练习，故国军兜剿之际，数十万大军，环围四周，彼辈毫不惊惧。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并有当地农工为彼协助，将国军诱引至山中绝地，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因而缴械遇害者甚多。盖北方军队既不习惯于登山，又不熟悉路径，兵虽多，械虽良，无用也。”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国内各大小报刊谈及都称“共匪”，而杜重远称“共党”，宣传其首领与士兵同住山下、地下，行动迅速，从容不迫，深得当地农工协助。字里行间洋溢赞许之意，这是冒了风险的。

1933年底，《生活》周刊遭到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杜重远不计个人安危，接过“邹韬奋手中的火炬”，于1934年2月正式创办《新生》周刊，以更加充实的内容、更加锐利的笔锋，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以便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新生》周刊问世后，大受欢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闲话皇帝》的短文，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提及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借机查封《新生》周刊，把杜重远投入监狱，并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对其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审判中，杜重远质问：“爱国何罪？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 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者群情激愤。愤怒的民众在雨后的夜晚，手持火把和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新生》”，跟随杜重远囚车前往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表示支持和声援。

《新生》事件震惊中外。同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明确表达了谴责国民党政府和支持杜重远的态度。宣言说：“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作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事实教育了杜重远，他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更坚定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三

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没有他的穿针引线，也许“西安事变”根本不可能发生。

1935年7月，杜重远被判囚于上海漕河泾监狱，后获保外就医，移至霞飞路虹桥疗养院软禁，直到1936年9月获释。其间，周恩来派当年张学良东北大学的高材生、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做杜重远的工作，不时给监禁中的杜重远送来马列主义书籍，传递党的最新决议和方针，对他教育鼓舞很大。

杜重远还将孙达生介绍给曾任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让其进一步认清抗日救国的真理。其实，杜重远在“九一八”事变前也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是张学良外交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流亡到关内以后，他又是张学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组成员之一，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挚友。

1935年10月，杜重远借高崇民、王化一等人来狱中看望他的机会，一起讨论东北军前途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军应该联共、联西北军，否则别无出路。为了说服张学良，杜重远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建议书》，由高崇民送抵西安。

1936年1月，高崇民和孙达生持杜斌丞好友杜重远的信来到西安，结织了杨虎城和杜斌丞，转达了张学良愿联合西北军抗日的口信。杜斌丞遂代表杨虎城与高崇民、孙达生建立了经常性联系，探讨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同抗日大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杜重远在狱中以书信和面谈的方式，对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12月及1936年4月，杜重远与两次来探访的张学良见面，深入分析形势，共商抗日大计。杜重远还与借称牙疼来虹桥疗养院治疗的杨虎城将军密切交谈过。

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于11月底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共在上海和西安代表的高度重视，并在11月29日去电告知延安称：“杜重远抵西安，对张学良将大力推动”。

不到两个星期，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事变中被扣，正在江西景德镇的杜重远也被国民党软禁，直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后，对杜重远的软禁才解除。宋子文在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改组南京政府，吸收一些抗日人士入阁时，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推荐了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杜重远为次长。由此可见，杜重远与“西安事变”关系非同一般。尽管他的名字当时从没在公开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报刊上出现过，但他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难以估量。

四

杜重远有意跨进共产党的大门。1938年，杜重远在武汉向周恩来递交了他本人及邹韬奋、萨空了委托的入党申请书。周恩来认可并感谢他们的热忱，但说：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身份地位，在党外活动可以自由得多，否则活动不方便。

杜重远理解共产党人的良苦用心，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他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辞谢了去美国工作的邀请，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和大城市生活。1939年1月，他携带家属前往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交通闭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

“七七”抗战爆发后，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杜重远分析当时的形势，看中了新疆。他想帮助他的留日同学、当时担任新疆省督办的盛世才，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这个时期的盛世才高举抗日旗帜，伪装进步，提出“联共”“联苏”的口号，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前去新疆。

杜重远把学校当作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已经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残酷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首当其冲。从1939年底起杜重远被停职、软禁。

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手臂疗伤后从苏联回国，在新疆同盛世才进行了三次会谈，提出杜重远与他同机返回内地。盛世才佯装同意，只说是下一班飞机就放行。周恩来长叹：“杜重远回不来了！”

杜重远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其家人也遭到残酷迫害，一家人被关在结核传染病院里，从此罹患各种疾病，遭受终身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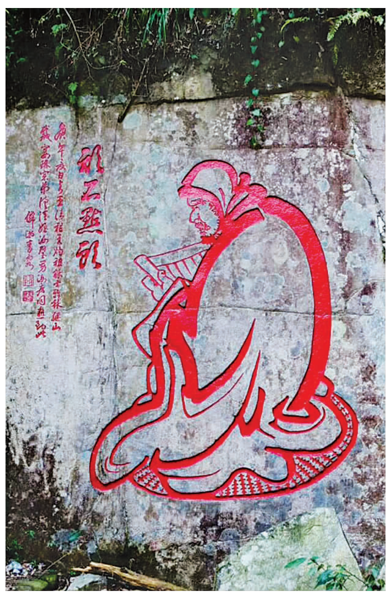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直到1945年才传入内地。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为他举行了纪念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誉他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习仲勋这样评价他：“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认识共产党，并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抗日的需要，他甘愿远赴边陲，从事艰苦的、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最后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上。杜重远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辉煌的。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我们时代的凯歌。他英勇奋斗的顽强精神，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今年是杜重远先生诞生120周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的伟大进程中，永远不能忘记“杜重远是党的患难之交”，是我党处于艰苦环境下，同我们并肩战斗的忠诚朋友。

从『顽石点头』说起

李志著



一张黑底的纸上，几道或粗或细的白色线条勾勒出了一个坐着捧书阅读的僧人模样，老爸指着它对我说，这是你曾祖创作的画像，从拓本复制而来，名为“顽石点头”，刻在福州鼓山的石壁上（上图）。那时我读初中，不明白曾祖为啥在石壁上画画，他是怎么画上去的，风吹雨打的，难道不怕坏，并且明明是和尚在看书，还叫什么“顽石点头”？但我当时好像只是“哦”了一声，没有把心中疑问提出来。大概见惯老爸收藏的曾祖画册及散页图片、画片，不过又增加一张而已，我丝毫未觉得稀奇。读大学后，尽管自己经常到福州，但都是赶车，匆匆忙忙的，从来没有去鼓山看看。

今年春节回家，我路过福州，特地去鼓山逛逛。身临其境，才领会到刘禹锡“山不在高”的诗意。鼓山不高，却林壑幽美，名胜甚多，尤其这里有不少名人题刻，号称中国的书法宝库之一。据称，鼓山摩崖题刻共有一百多处，五百余方，从北宋到当代，真草隶篆齐全，置身其中，犹如进入书法展厅，琳琅满目，应接不暇。现存最早的是我们仙游先贤、北宋书家蔡襄的真书题刻，最晚的则是当代文豪郭沫若的书作。这些摩崖题刻刚用红漆重新勾画，焕然一新，鲜艳夺目，使过年的气氛愈发浓厚。在诸家书法题刻中，夹杂着三两幅画像，曾祖的作品是最大幅者，位于灵源洞的喝水岩下，高约三米，宽约二米。虽然是巨幅大制，但因为触手可及，并不感到震撼和压抑，反而觉得可亲可近，朴实自然。我仔细观摩，发现小时候所见拓片看不清僧人面目打扮，款识也若有若无，严重模糊失真，眼前的原作经红漆描摹后，在斑驳的石壁上，显得非常突出和清晰：僧人虬须虎眉，披袍戴帽，趺坐蒲团，展卷读经；左上角刻有草书款识，分别是“顽石点头”四个大字，以及三行小字，前两行多为人名，有些字认不出，大意是庚午夏日与朋友子侄同游至此；最后一行落款“仙游李霞”，并钤有朱白印章各一方。据此可知，该巨幅系1930年夏曾祖偕亲朋游览鼓山后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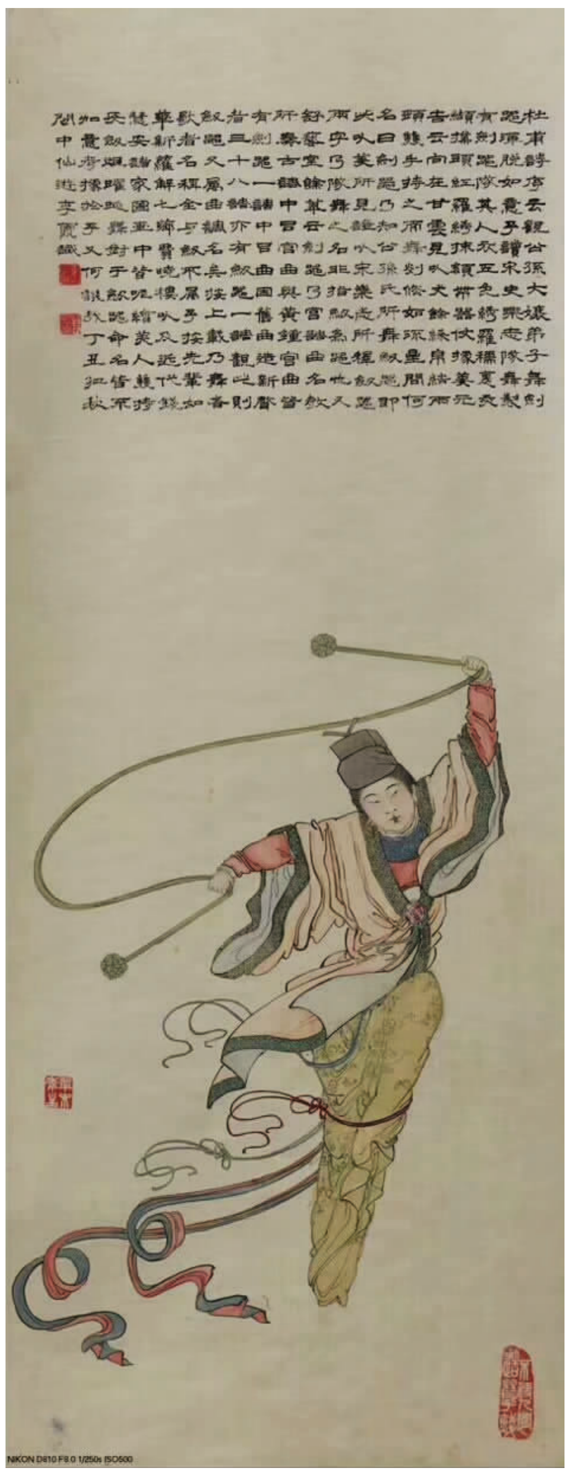
遥想当年，曾祖六十初度，已颇具声名，卓然成家，有资格在鼓山摩崖题刻。在游览考察鼓山胜景之后，他选择古往今来题刻最为集中的灵源洞发表画作。这里岩秀谷幽，巨石林立，曾祖巧妙地利用这个自然景观，选择“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进行创作。无名氏《莲社高贤传》云：“竺道生入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槃经》，群石皆为点头。”因此他仅画“生公说法”，而群石都是现成的，可谓寓画于景。但拓本无法表现这个意境，让年少的我莫名其妙，当然也因为那时还不懂这些典实。要在一块巨石上描绘单个人物，自然不能精雕细琢，所以曾祖因地制宜，运用简括雄犷的笔触，寥寥数笔勾勒衣纹轮廓，再辅以局部的精加工，从而把生公讲经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

曾祖擅用大笔写人物，线条粗犷，简练豪放，雄健有力，但他并非仅此“一招鲜”，与此迥然相异的笔触细腻，线条繁复，飘逸灵动，他也非常拿手。我新近看到的曾祖《公孙大娘舞剑器》图就是如此。如果说《顽石点头》是写意的，那么这幅画则为工笔，细描精写，把杜甫诗中公孙大娘的绝世容颜、曼妙舞姿刻画得惟妙惟肖。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是千古名篇，然公孙大娘的“舞剑器”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唐以来就有争论，大致形成四种看法：第一是持剑而舞，第二是空手而舞，第三是执刀而舞，第四是持彩帛而舞。四说至今仍聚讼不休。曾祖刚开始可能不知道学界的争讼，想当然地以为舞剑器就是舞剑，最初作《公孙舞剑》图，画的就是公孙大娘舞双剑。随着他交游的广阔，尤其是跟一些文人雅士结交后，了解到对公孙大娘“舞剑器”的认识存有争议，于是他搜集资料，作了番研究考证后，赞成第四种看法，于是重新创作。

这幅重新创作的《公孙大娘舞剑器》即我前面提到的最近才见到的那幅。图上方的款识即曾祖的考证文章，用隶体书写，全文如下：

杜甫诗序云：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浑脱如意。予读《宋史·乐志》，队舞制有剑器队，其人衣五色绣罗襦，裹交缬（脚）幞头，红罗绣抹额，带器仗。据姜元吉云：向在甘云（肃）见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剡倏如流星，问何名，曰剑器，乃知公孙氏所舞剑器即此。以姜所见，证以宋《乐志》所释，“剑器”两字乃队舞之名，非指剑为器也。又《舒艺堂余笔》云：剑器乃官调曲名，教（坊）所奏古调，中吕宫曲与黄钟宫曲皆有剑器一调，中吕曲因旧曲造新声者三（五）十八调，亦有剑器一调。观此，则剑器又属曲调名矣。按上载乃舞者、歌者名称，全与剑不属。予按先辈如华新罗、解（改）七芗、费晓楼以及近代钱慧安诸家图画中，皆呢绘美人双持长剑距跃跳舞，对于剑器命名皆不加意考据，于予又何讥哉？丁丑孟秋，闽中仙游李霞识。**（注：文中括号内文字为据曾祖所引材料而改正的字和补充的脱字）**

根据上文，曾祖引用《宋史·乐志》、张文虎《舒艺堂余笔》等材料，指出“剑器”乃队舞之名、曲调之名，都跟剑无关，又据桂馥《札朴》载姜元吉在甘肃亲眼所见当地女子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遂支持第四种看法，重新创作《公孙大娘舞剑器》图。图上落款“丁丑孟秋”，即1937年8、9月，其时离他去世不到一年。曾祖父这种勤求博采、老而弥笃，勇于自我否定、自我纠正的治艺精神和态度，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今年是曾祖父去世80周年，谨以此文聊表纪念。



公孙大娘舞剑器
（国画）
李霞

读些别的看看

王贺

最近接连读到《参差》《太阳花》等所谓“民间刊物”(下简作“民刊”)，颇感兴味。

多年前，为了准备丁玲研究的论文，找几本《丁玲研究》看，费尽周折。后来从学院资料室中，无意间看到该杂志寄丁河生老师的样刊，遂冒昧与当时已退休、完全陌生的丁老师联系，请其出借所藏该刊，始得一偿夙愿。我以后发表的论文，所引用的来自《丁玲研究》的论文，正是由此得来。记得当时丁老师的身体似不大好，那一包刊物，是她的爱人交给我的，说是送给我去看，后来，我们便再也没有见过面。

其后，承蒙王中忱、解志熙两位老师介绍，我也加入了中国丁玲研究会。作为会员，缴纳了会费，提交了论文，照例每期会收到该会的机关刊物《丁玲研究》。无论其间的宏论札记，还是学术动态，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这是不必赘言的。

这些刊物的民间身份并不影响我和朋友们对它们的重视。譬如去年12月，上海巴金故居出品的《点滴》杂志，就推出过“庆祝陈子善教授七十华诞暨从教四十周年”的专辑，一时成为学林佳话。专辑内收郑绩、陕庆、宫立、张可可、张德强诸同门大作，德强兄甚且有诗形容先生日常生活，其末四句云：“左抱皮皮右挥毫，更有多多卧脚暖。最喜弟弟小无赖，痴观女猫坐窗前。”深惬我心。

专辑中，我也有幸写了一篇题作“陈门立雪小记”的小文，略述数年从学因缘，但与他们诸位的生花妙笔相比，真是自愧弗如。拙文有一段话这样写道——

“私下里和朋友们聊天，我常说，最佩服陈老师的除了他满腹的经纶、典故，还有他那超乎常人的精力、记忆力，以及待任何人都充满真诚、毫无戒备的赤子之心。这后一方面，也正如其素所敬重且认作恩师的钱谷融先生，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先生’的人格之美，感受到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活着的传统的魅力；而前一方面，我认识的师长、亲友们中间，至今仍无一能及之者。我还曾开玩笑说，‘和陈老师一起搭地铁、挤公车，我发现，很少有人给陈老师让座，为什么呢？——因为古稀之年的老师，看起来仍然和中年人一样，目光炯炯，精神抖擞，浑身充满了活力。’这虽然是戏言，但绝非恭维之辞。熟悉陈老师的人都知道，以名声在外之故，他常受邀出席各种社会活动，但每一活动结束，却丝毫不见其倦态，仍笑容满面，神采奕奕，有如初见。”

今年春天和几个外地的读书人见面，一打开话匣子，他们竟然不约而同提到这段话。《点滴》的影响力至此可见一斑。

《参差》《太阳花》等新创的“民刊”，虽然不及《点滴》影响之大，但是作为“毛边党人”，恐怕也没有不知道《参差》大名的；《太阳花》是徐志摩纪念馆的馆刊，关注徐志摩其人其文的朋友，多也听说过。

我读《参差》，读龚明德的《硬面精装书的毛边尝试两例》《我做毛边书“老版本”》等，对制作“毛边本”的工艺，似乎有了一点概念；读韦泱的《将错就错迎〈春〉色》等文，知道包括巴金的名作《春》在内的新文学作品，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版本需要研究；读沈文冲谈毛边本史话、李树德论姜德明缘何告别“毛边党”、赵龙江说唐弢与昔年同事陆象贤的交谊，均在某一方面很受启发；更不用说陈子善先生的“我收藏的毛边本系列”文章，不仅每篇都有新材料、新见地，而且纯就写法而言，也是那样精警而富有趣味。

这些《参差》的作者，既有学院中人，也不乏学院外其他行业的收藏者与文学爱好者。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趣味，聚到一起，以《参差》为纽带，激扬文字，交换信息，分享彼此的收藏及心得，这些心得既令人深受教益，也显著地弥补了现行的文学史、文献学、图书馆学等领域专业训练的不足，委实值得重视。至于那些由专门的学术团体主办的所谓“民刊”，就更是如此了。

洪业年轻时，有人曾经给他说过一段话，对他影响很大：“你对经典很熟悉，而反对它很多的地方。可是这不是读书的办法，读任何书都不能用这种方法。书是古人经验的结晶，好的坏的都有；就像有人摆了一桌筵席给你吃，你应该拣爱吃的吃，不好消化的不吃。古书的语言换了几次，所以看的时候要拣好的记着，其余的不要。里面的错误、前后矛盾的地方是难免的。但有些看来似是矛盾的地方，往往以后发现并不矛盾；但你专心去记那些，等于白费脑筋。”（《洪业传》）是的，这是我一直在说的观点：读书就好比吃饭，我们拣自己喜欢吃的、别人做的好吃的多吃，不就行了，与其横挑鼻子竖挑眼，到处商榷，还不如不读。

现在，学界朋友们聚会，似乎不抱怨一下本科生研究生不读书、学问差，几乎没法举箸酌酒，但有时候，我也不免怀疑，指导他们的老师们，是否真正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最起码，比如说，告诉他们，世界上，除了“度娘”、“知网”，还有些别的东西要读、要找？

2018年4月16日于沪

笔会

记录

“文汇笔会”
微信二维码